

陕西古代史

杨东晨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杨东晨 著

陕西古代史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4 号

1996. 4. 25

西安吉旧书店

No. 0003312

陕西古代史

杨东晨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 376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师大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26 印张 5 插页 669 千字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7-5419-6065-9/G · 5243

定 价: 40.00 元

谨 以

此书奉献给养育我生活工作过三十四年的陕西人民！

作者简介

杨东晨，1941年生于河南孟津黄河畔的山村，自幼受到较好的家庭熏陶，酷爱文学、历史和绘画。在经历从事文学、教学、行政工作后，于七十年代后期，终又走上历史研究的道路。他现为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先秦及秦汉史学会会员。兼丝绸之路研究所副所长。

他不为世俗所动，甘心清淡，埋头书案，已有《中华都城要览》、《秦人秘史》、《周人秘史》等八本著作及论文百余篇问世，并担任《三秦丛书》、《黄土文化丛书》与《中国古代史学习指南》副主编、主编。这五百多万字的著作，记录了一个知识分子艰苦跋涉的足迹。《中国专家人名辞典》、《中国当代史学者辞典》、《中国方志学者辞典》等，均已收进他的名字和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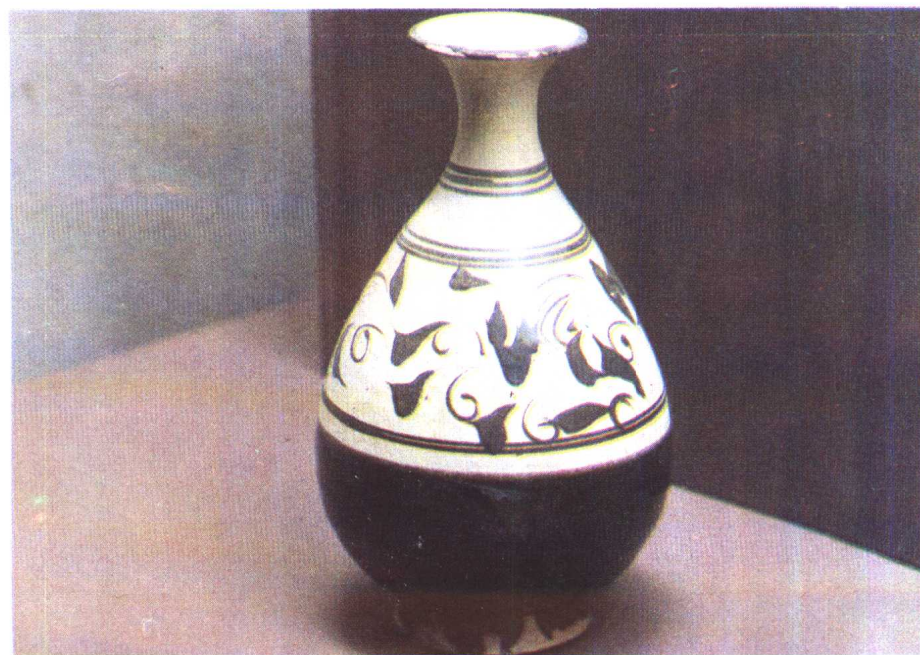
唐“塞金兽首玛瑙杯”(西安出土)



唐“鎏金八棱伎乐银杯”(西安出土)



北宋耀州窑“青釉印花盘”



元代耀州窑“姜黄釉黑花玉壶春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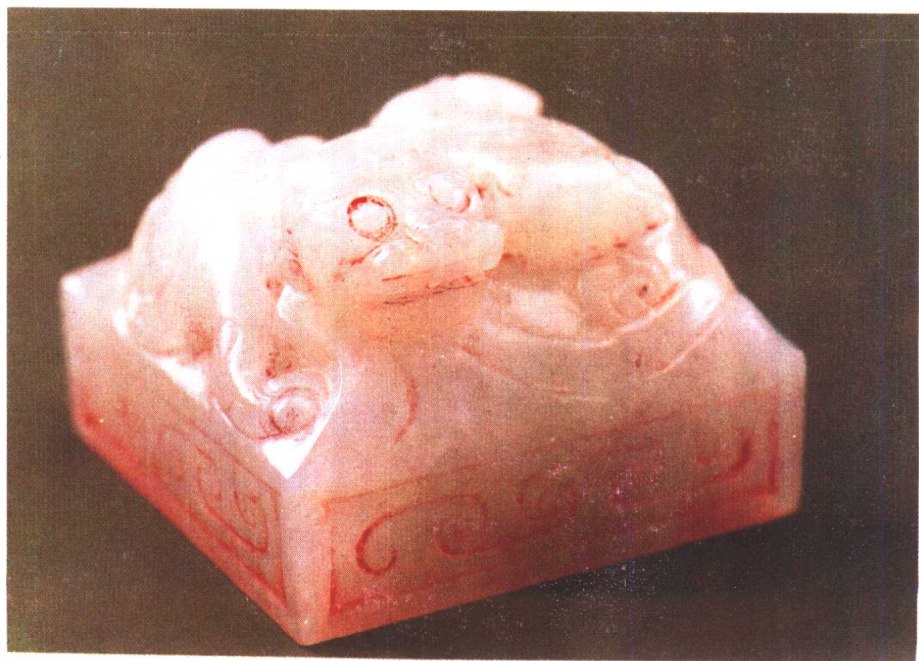
西周铜器“伯各卣”(宝鸡出土)



西周烹饪器“周生鬲”(扶风出土)



战国秦“杜虎符”(西安出土)



西汉吕后“皇后之玺”玉玺(咸阳出土)

序 一

杨东晨同志著的《陕西古代史》，是继武伯纶先生的《西安历史述略》之后的第二本有关陕西地方史的综合性专著，不过他写得更广泛一些。这是两部优秀的有关陕西地区史的乡土教材。如果就陕西的历史地位和所论史实而言，也可以视为国史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

陕西地区不论地望或人文，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今天最流行的两句话是“八百里秦川文武圣地，五千年历史古今名城”。这是对陕西历史十分恰当的概括。

陕西居黄河中游的形胜之区，南北纵跨寒、温、热三个不同的气候带。关中一隅，独擅地利之宜，气候湿润，土地肥美，素有天府沃壤之称，因而就成为古今人文荟萃之区。

由于陕西地区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历史考古界、文学艺术界各方面的学者、专家，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对其作了广泛的研究和深刻的探讨，并反映在史学、文学（包括小说、散文、诗歌、电影及戏剧等）各个方面，令人鼓舞。但至今尚没有一本较完整的、系统的、适于广大群众阅读的陕西历史著作，不能不使人有渴望之感。东晨同志写的《陕西古代史》，在此脱颖而出，填补了这个空白，实在是陕西史学界一件值得庆幸的好事。

东晨同志的书稿完成后，送来嘱我为之作序。在欣慰之余，我通读了全稿，觉得它是鉴古益今的一本很好的历史读物：体例完备，论述精辟，史论结合得当，内容翔实丰富，加之流畅的文笔，成为一部具有科学性、资料性和可读性的优秀著述。因此，我愿在此向学术界、尤其是青年学子和学者郑重地推荐这部富有学术

价值的历史专著。

可能由于我是陕西人，生于此、长于此、学于此，受传统文化和乡情熏陶轮深，工作后又多在陕西地区，且从事文物考古工作，因此与古文史结下了不解之缘，可说乡情国情萦系于怀。读东晨的《陕西古代史》，感到倍觉亲切，从而油然而引发了我思古之豪情，欲藉这个篇幅，谈谈读后的一些感想。

首先我要说的是：东晨同志写这部书的旨意是值得嘉许的，他承继并发扬了中国写地方史志的优良传统。我们中华民族维护国体统一和历史文化传统的优良机制之一，是有丰富的地方史志丛集，代代相传，绵延不断，成为世界历史文化中的一丛奇葩。它把乡情国情浓密地融汇在一起，集文化史迹于一册，而维系国脉于不坠，因此，写地方史志，是我国优良史学传统的工作之一。近多年来，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对地方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即综合研究地方史志的书籍，接踵而出。这是研究地方史志水平的发展和提高，也是史学界值得称颂的一件好事，更是应时代之呼唤而出的健康社会思潮和学术动向。因为现阶段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需要我们总结和借鉴历史经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吸取滋养和精神。《陕西古代史》的出版，可以说是顺应时势和人民群众之需要的。不言而喻，它是一定能在广大读者和学术界产生良好的影响和积极作用的。

其次，我要说的是：《陕西古代史》在内容方面的丰富和对历史事件的典型论述。在这里可以提示的是：

第一，从建置沿革详记陕西行政区划的变迁。

史载：自西周时周公、召公以陕陌为界，东西分疆而始，陕之名称见于史籍，而陕西之名，当自宋代设陕西路始。因秦之勃兴于此，故简称陕或秦。夏、商、周三代，《禹贡》列陕疆为雍州、梁州境，秦朝分上郡、内史与汉中三郡治。秦汉之际，项羽入关，封秦之降将三人于关中三辅，三秦之名，由此而起。汉代陕北归

朔方刺史部，关中属雍州，陕南属益州。曹魏时，秦岭以北属雍州，陕南属梁州。南北朝时，在陕西境置银州（今榆林）、绥州（今绥德）、丹州（今宜川）、雍州（今关中及甘肃部分）、洋州（今洋县）。隋代陕北、关中属雍州，汉中、安康属梁州，商洛属豫州。唐与五代时，关中、商洛为京畿道，陕北为关内道，汉中、安康属山南西道、东道。后又分置凤翔、邠宁、夏州、山南诸路节度使。及至北宋，设陕西路，辖关中、商雒及延安；榆林东北归河东路，西北归西夏；汉中属峡西路，安康属京西路。后因军事需要，宋又改陕西路为永兴军路，兼领秦凤、利州、京西、河东四路。南宋时，安康、汉中归利州（今汉中）路；金朝占领秦岭以北地区，设京兆府及凤翔、鄜延路。元代设四川陕西行省，后置陕西省，辖陕北、关中、陕南全境。明代设陕西布政使司，辖区扩大至包括今甘肃、宁夏、青海的一部分。清朝时，陕、甘分治，设陕西，沿袭至今。这就给读者以明晰的概念和认识。

第二，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阐明了陕西地望与历史文化发展的联系。

陕西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文明的摇篮地之一，是由其得地独宜之利决定的。《史记》载，苏秦说秦惠王时称：“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据关中可以成霸业，统一天下。周秦之所以兴，汉唐之所以盛，皆与陕西地理之形胜有关。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主轴壮剧，多在这里上演，产生了许多有丰功伟绩的人物和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真堪称物华天宝、地灵人杰之区也！其影响于人文发展者，主要有二端：

其一，地扼天下之要衢。陕西地处中原之左垒，扼西北、西南与中原交通之户枢。秦汉以前，中国对外交通端赖走向中亚的前丝绸大道和走向川蜀的西南孔道，皆会集关中，然后转播中原及东方各地。周武王伐纣所率之八部，皆这一地区的方国诸侯，西向可以固附诸国，东向可以制衡天下。周秦之所以统一中国，皆

依赖此地势之利。

其二，物擅天下之富庶。关中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美，物产丰饶，《诗》云“旻旻周原，如茶如飴”，《国语》曰“关中沃野，土阜民勤。”很早就是中国农业垦殖区之一，也是中国最早的农神“后稷”之诞生地。秦汉以后，建立各种先进的水利设施，使陕西成为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农业丰收，商业兴旺，周、秦、汉、唐诸代，依此殷实宏富的经济基础，始有强大兴盛的文治武功，从而给读者以深刻印象。

第三，书中深刻地探讨了陕西地区所形成的文化特点及其在民族历史文化方面的地位和作用。

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是中华各族在发展过程中由多元向融合的综合体。它是贯通、渗透于民族文化的各个领域和层次中的精神素质。整个民族历史文化的形成，蕴藏于各个地区的历史文化之中。而陕西地区，既有其地方独特的文化素质，也有集中华民族精粹的主体文化意识和特点。这些特点铸造了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和气质。其主要点是：

其一，昂扬进取的开拓、融合精神。古老中华先民，是世界上最富有进取和开拓精神的民族之一，尤其在汉唐及其以前各时代，即以陕西为中心而建都的那些时代。且不说原始时代的移民迁徙，从文明时代起，不论穆天子西征，还是秦穆公霸西戎，都说明西北先民与外界早有接触。外国人称中国为支那（China），是由秦音转译而成。因为秦人最早向西开拓而与西方民族接触的民族。周人兴于西陲而能君临天下，统一中国，为中华民族的融合凝聚奠定了基本模式。秦、汉、唐三代，都是富有开拓精神和气度的时代。他们都十分重视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信息传播，并能吸取邻国的人才智慧和文化成果为我所用，因而能跻于富强康乐之途。秦能用客卿，广揽英才，故能集天下之智，谋天下之事，终于完成统一大业。汉通西域，开辟了世界历史上最壮丽的“传播文化和友谊”的丝绸之路。通过丝绸之路逆旅，与

西域各国开展广泛的国际交流，扬大汉之天声于异域。唐兴，继秦汉先烈之余绪，大展盛唐之雄风，采取开放和兼容政策，广开国际交流，西至波斯、中亚、印度，东达日本，形成了万国冠拜圣朝，熔中西文化于一炉的空前盛况，使国都长安，成为当时与西方罗马并称的东方世界之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不论在政治、经济或文化诸方面，在当时世界上，唐朝都是领先的。唐代是我国历史上融合中外文化最成功的一个时代，从民族的融合，进而为文化的融合，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随着开拓事业的发展，陕西地区也涌现出一批富有开拓精神的、彪炳千秋的历史人物：有出使西域的张骞、班超；交趾立柱的马援；燕然勒铭的窦宪；远嫁边陲的公主们；负笈万里求真经的玄奘等僧侣。他们都是肩负历史使命，为中国与邻国之间、民族之间的发展和友谊而做出特殊历史贡献的英雄人物和志士。

其二，博大宏阔，浑厚凝重的气质。华夏民族形成于中原，而成为富有凝聚力的国家民族实体，是在关中地区。中国古代的礼乐制度及文化模式，形成而影响于后世者从西周起，经过长期交往融合，至秦汉而形成统一的国家。周秦对中华民族总体的形成及其文化的传统的奠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在大一统的汉唐时代，使长安成为凝结的核心。中华民族的重群体、重统一、重乡土等集中的价值观念和乡土情感，基本上是以长安为中心的历史时代培育而成的。在深厚的黄土高原和富饶的秦川大地，孕育而生成这些优秀文化成果，形式多样，内涵丰富，气势宏阔，风格凝重，表现出一种浑厚博大的精神气质。从文王、武王、周公、秦皇、汉武以至唐太宗时代的历史功业中，都贯穿着这一传统的、优良观念和形态。

其三，富有传统优良的道德精神。关中民纯好学，富有先王之遗风。中华民族素称“礼仪之邦”，而立国的一切礼乐制度、人伦道德，乃至建筑規制等，皆肇始于西周。其滋养成长的源头是

在关中地区，从文武、周公一直到宋代理学，一脉承传下来。周代的“以德配天”、“敬德保民”和“民为邦本”的思想，一直成为后来儒家重道德、重现实的主导思想。孔子虽为东方鲁人，却以继承道德自居。他总是说“吾从周”，并言梦见周公，即扬周之道而统驭天下，把周人的敬德重民传统，礼乐文化、博济众而亲民的仁爱精神，形成儒家思想的精髓。司马迁作《史记》，班氏兄妹著《汉书》，也是继承这一传统。及至宋代关学大师张载，提出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升太平”，表现出继承传统，以天下为己任的宏阔胸怀。直到明清，秦人还是“慕经学、重处士、持诂议”。在这一时期，确有重节操，为天下谋的仁人志士。这些都再次体现了陕西继承历史优良道德的渊源深根。

这些探讨，不仅使《陕西古代史》增色，而且提高了陕西地区史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也避免了夸大地方史、忽视与中国史比较的研究倾向。

再次，我要说的是该书的又一特点，也是它的优点，就是较多地利用了考古资料，丰富了内容，深化了读者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如前所述，陕西是华夏文明的摇篮地之一，保藏着人类百万年来完整演化的历史断面。在洪荒的原始时代，从百余万年前的蓝田猿人，经大荔人和半坡人的披荆斩棘，开辟了这块生息繁衍的三秦大地。在进入文明时代以后，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繁荣发达的奴隶、封建社会时期，先后有十三个王朝和政权在这里建都，绘出一幅辉煌的历史画卷，地上地下保存着极其丰富而珍贵的文物宝藏。这些瑰宝，是中华先民聪明才智和劳动创造的结晶，闪耀着民族智慧的光辉。每个文化遗迹，都是我们祖先摆脱蒙昧、野蛮，走向文明的足迹。它最集中地表现出我们民族历史文化优秀特质的典型性和发展承传的系统性。东晨同志利用了考古发现中最富科学价值的实物资料，与文献史料相结合，充实了有关时代的历史内容，浓化了沉郁的历史乡情，更生动、真实地体现了

历史的本质，使读者更能深刻的理解历史发展的规律，接受真切的历史唯物主义教育。

最后，我要说的是，本书之所以能对陕西历史作聚精竭辟地阐述，是与作者窥秘揭奥的求索精神分不开的。学术研究和办事业一样，要取得成功，必须要有胆识和务实精神，东晨同志赋有这种素质。他的为学和为人一样，朴实无华，埋头苦干，孜孜不倦地在史学园地中勤恳耕耘。我与东晨相识，始自他八十年代中期由铜川调入半坡博物馆时。我和他相识接触后，知道他是重视理论、勤于问津文史殿堂的富有学术活力的年轻学者。从他写的文章及谈论中，深知他勤奋好学，不畏艰难，博览群书，知识面广，在科学道路上，勇于攀登，一部部、一篇篇专著、论文，相继问世，十年之间，出版专著达数百万言，恕我不一一枚举了。他是我省文博界及全国突出的、著述宏富的专家之一。他的著作，得到学术界的赞许和好评。本书是他继《中华都城要览》、《秦人秘史》、《周人秘史》、《漆水集》等8部书之后的又一部力作。它的出版，正是近期他在学术园地里务实耕耘的成果，也是他为中国史和陕西地方史的研究，做出的又一重要贡献。我也期望他研究陕西史的《战马上的伟人》、《黄土都城学》，早日与读者见面。

当然，要在一册有限的篇幅中，对百余万年的繁冗史迹，全面而精到的论述各个部分，是有局限性的，也是困难的。我认为，如果作者在对马克思主义有关史学的理论，能再下些功力，并实践地作些探讨，那么百尺竿头，将会大进一步，今后会写出更多更好的著作，以飨读者，前景会是广阔无限的。这是我在谈了自己的感怀之后，对作者和青年学者所能寄予的厚望了。

石兴邦

一九九四年春节

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序 二

《陕西古代史》是杨东晨同志的新作，也是杨东晨同志研究中国古代史的重要著作中又一部令人瞩目的成果。

对于我们自己祖国历史的研究，正如孔子所讲的一句名言：“学然后知不足”，愈对历史了解得多，愈觉得有更多的问题需要研究。因为，研究历史不仅能够“温故”，而且能够“知新”，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一切知识无非都是历史。更何况中国的历史，中国人的历史，确切地说中国人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乃是世界最古老、最长远、最丰富的。其中足以令后人增进智慧的、增长教益的、使人变得愈来愈聪明的东西，应当说是取之不尽的。所谓“取之不尽”绝非夸张之辞，乃是客观事实，之所以“不尽”，全国史学家对于历史资料的研究、处理，通过不同的角度观察，运用不同的方式、针对不同的问题阐释，从而得出启迪当代人才智的答案。所以，历史乃是人类自身永远用之不竭的财富，历史研究永远没有止境。

近年来，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许多青年人一心扑在“经济效益”上，对于距离“经济效益”稍远一点的历史和文化，显得没多少兴趣。表面看来，这种现象似乎无关大局，但若认真思索就会令人担忧。今天，笔者就听到一个号称中国某名牌大学的文科毕业生以极其鄙薄的口吻说：“我们最看不起学历史的，最看不起研究历史的”。听到这话，真使我不寒而慄。使我感到寒心的倒不仅仅是这一个年轻人的浅薄、无知，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第一流的名牌大学竟然能培养出这种愚蠢的文科学生，而且她所谓的“我们”，当然也不是这个准白痴一个，其中必然包括影响她、

或和她有同感的一类人，譬如同学，父母、叔叔、伯伯之类。要命的是这样一群鄙薄自己祖先，不懂历史，以至不知道历史为何物的糊涂虫竟然也混迹於“知识分子”之间，而且自命为什么什么玩意儿，说不定碰巧了还能担负着什么重任。那样一来，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我们祖先数千年遗留下的古老而辉煌的文明，其前景实在不堪设想了。

也许正是面对着这样的危机，在我们中年的历史学者中，有一些身负使命感的饱学之士高瞻远瞩，不为世俗所扰，甘居淡泊，孜孜不倦地为弘扬祖国文化，埋头研究历史，杨东晨同志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东晨同志早年学习外语，曾做过教育工作和行政工作，但本人始终酷爱中国历史，醉心学术研究，鄙弃官位和利禄，数十年如一日地钻研中国古代史。并且取得相当大的成果，近十年来竟有数百篇论文、八本专著发表，成为中国历史学界引人注目的中年学者。

东晨同志研究的范围很广，但其重点是秦汉时期。而对秦汉时期的研究，又十分着重“地域性”的区分。这种“地域性”的区分研究，是我近年来一再提倡和努力为之的。可惜自己做出的成果很少，却有不少师友做出了显著的成果，譬如山东的逢振镐先生对山东和中国东部地区的历史研究，四川的彭年先生对巴蜀地区的历史研究，陕西的彭曦先生对陕、甘地区长城的研究等等，都取得了令人敬佩的成果。在东邻日本，茨城大学鹤间和幸教授还把这种研究发展成为一种流派或方法，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现在，杨东晨又将一本《陕西古代史》放入中国古代地域性研究的百花园中，无疑将使凋零、冷落的史学研究园地增添一股春意，给翘首等待的人们一丝希望。而《陕西古代史》的问世，其深远意义则是不言而喻的了。

东晨同志做学问与其本人的为人一样：敦厚、朴实。笔者与东晨虽相识已久，却仅限于文字和学术的交往，真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正因为其淡如水，没有任何世俗的交易，所以友谊得